



□专题：生活实践研究

牧民生计现代转变的微观机制 探究

——一项对牧民生命历程的社会学研究

郭伟和 贾 聪

摘要：生命历程研究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大多数生命历程研究围绕结构机会与个体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展开，自动假设个体为能动的主体，可以主动抓住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机会。然而，能动性并非天生形成的，而是一种通过对在特定生活场域所塑造的身体习性的批判反思转变而来的主体特征。通过对一个青年牧民生命历程的回溯，阐释了牧民在面对传统游牧生计向现代牧业生计转型时所产生的摇摆不定的“草原情结”，如何通过对生命历程的反思转变成一种反思性能动主体，进而通过杂糅传统牧民文化与现代发展方式，来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困境。本文一方面扩展了国内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视野，把微观主体习性的重塑过程带到学术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对牧民草原情结的反思重构，展现出游牧生计现代转变的微观机制。

关键词：生命历程；草原情结；反思主体性；新发展方式

作者简介：郭伟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区发展、社会工作等；贾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区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2019年领军人才资助项目“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社区治理转型研究”（10700—2020000206）。

一、研究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面对民族地区发展转型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把它上升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全球化的关系高度来认识文化自觉(费孝通,2003)。实际上,民族地区的生计传统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更加脆弱。一些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对现代化进程中牧民主体性的缺失进行了反思批评。麻国庆、张亮(2012)通过对阿拉善地区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的考察,指出本地居民能够自觉支配自己发展方向的能力越发虚弱,草原牧民拥有自觉的发展诉求,现代牧区社会的发展亦需要尊重地方文化的合理性,走牧民“自主性”发展的道路。包智明、石腾飞(2020)进一步提出,要解决当前草原生态治理的挑战,化解草原生态保护与牧区发展的内在冲突,就必须重视和增强牧民的主体性地位,根据生活和多元生计的需要,实现牧民在牧区和城镇之间的自由流动,不断传承和发展牧民的生态价值。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草原牧区的发展应当尊重牧民的自主选择,提倡从游牧文化中汲取牧区发展的知识与养分(韩念勇主编,2011;张昆,2019;荀丽丽,2011)。这些研究已经注意到牧区生计现代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微观机制问题。但是,牧民身份转换与生计转型之关系问题以及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探讨牧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促进牧民的文化自觉和激发内生动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诚然,发展能动性的产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行动者“要成为”的过程(王星、周重礼,2023)。那么这种“要成为”是如何、从何处、通过谁以及为了谁而建构起来的,在草原牧区现代化的进程中,牧民作为行动的主体有着什么样的主观体验,发展能动性又如何产生,这种能动性的生成在何种程度上塑造着自身和牧区的发展方式?对于这些问题,不能从静态的方法去访问和观察,而是需要从牧民个体的生命历程的动态过程加以考察。

二、理论回顾：何谓能动性，哪种生命历程？

在社会科学领域，主体与结构常常成对出现，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持“结构”取向的学者强调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规范等因素对主体的支配与制约作用，而关注“主体性”的学者更侧重于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主体对结构所具有的形塑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性已然回归，并且变成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从宗教到劳动、从个体到家庭、从文化到身体，社会科学家越来越赋予主体性以重要地位（维沃尔卡，2017：15—30）。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践场域理论为消除结构与主体的二元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吉登斯，2016；布尔迪厄，2017）。然而，无论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还是布迪厄的实践场域理论，都是通过一种微观的结构化行动程式或行动习性来把宏观结构内化到微观行动主体中，用微观的行动程式或者习性来再生产宏观结构，二者仍然没有说清楚社会转型发展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围绕主观能动性问题，主流的理论范式是沿着生命历程理论，通过追踪研究或者回溯研究来阐明个体如何面对结构性限制和条件机会，进而实现生命历程的能动性转变。生命历程理论范式分为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开创的生命历程理论和法国学者伯陶开创的生命历程理论。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预设微观主体就是一个能够抓住生命机遇的能动主体，进而实现个体生命历程的能动性转变。但是，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只是展现了个体生命历程能动性改变的轨迹和条件，并没有说清楚在生命历程中面对条件机遇保持机智灵活的能动主体从何而来。而伯陶的生命历程理论则是通过行为习性的塑造过程来阐述微观主体特征与特定行业结构条件的匹配过程。然而，这依然面临着社会转型带来的行为习性过时失效的问题。因此，我们才需要把布迪厄提出的反思实践理论和舍恩的反思行动的职业能力理论带回来，讨论微观行为习性的塑造与失效后的重塑转变问题。

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掀起了美国生命历程研究的新高潮，他特别强调个体的生命历程深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事件的影响，并着重探讨了个体对历史事件的反应方式（埃尔德，2002：421）。个人的生命轨迹嵌入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一些重要的事件会形塑个体的生命轨迹，而一些预期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节点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也会带来个体角

色的转换或命运的转折（曾迪洋，2016）。个体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不同的社会景观使得个体拥有的社会机会和受到的社会限制各有不同（李强等，1999），从而塑造出不同的生命历程，个人生命历程可以视为宏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周雪光（2015）指出，当代社会生命历程已经越来越被国家制度化，社会与经济转型重组着个体不同生命阶段的制度资源、约束和不同选择。事实上，埃尔德范式非常强调生命历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但他关心的是特殊事件对生命历程造成的转折与机会，把特殊事件当做原因，将转折后的生命历程轨迹当做结果（郑作彧、胡珊，2018）。

透过埃尔德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生命轨迹的变化，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的社会环境、结构制度给予的机会和限制，另一方面，个体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埃尔德为代表的生命历程研究的美国社会学传统在处理结构与主体的关系时，倾向于从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分析个体与结构的关系。这仍然是一种二元论的本体假设，二者的矛盾关系成为一种辩证的相互推动的关系。这一派的生命历程模式假定微观主体就是一个能动主体，可是并没有阐明能动主体是如何产生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需要引入法国生命历程学派对身体习性的讨论。他们从现象学出发，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置于特定场域下生命展开与习性构造的状态来处理二者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思路。

法国学者伯陶和德国学者科利（Martin Kohli）将生命史研究的趋势分为两种：一种趋势主要关注生命史在社会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另一种则以民族志的方式，通过准确描述受访者在社会背景下的生活轨迹，以揭示社会关系的模式和塑造主体的特殊过程（Bertaux & Kohli, 1984 : 215—237）。这种从现象学角度关注个体生命历程中不同行动场域对个体生命习性的塑造和意义建构的视角，揭示了微观主体的生成机制。以法国学者伯陶对法国面包师的职业习性研究为例，法国人食用的90%的面包由手工面包房生产和销售，这在早已以工业化生产为主的发达工业国家中相当独特。作者通过对法国手工面包师生命史的书写，阐释了手工面包行业传承的微观机制主要是法国手工面包师在学徒制下塑造了“努力工作”的身体习性，这种身体习性能够维持手工面包店长期生存，进而阻挡工业化进程中手工面包店消失的趋势（Bertaux & Bertaux-Wiame, 1981）。

伯陶的研究取向启发人们书写个人生命史时应注意身体习性的养成机制问题。对于身体习性的养成问题,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阐述得更加系统深入。布迪厄认为“实践感”或“实践理性”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实践感是由一种既不属于客观因素又不完全属于纯粹主观意识的东西,即“实践惯习”(habitus)所引导的。结构条件的制约与特定的互动结合生成实践惯习,实践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身体习性,是一些有结构特征的行动程式,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身体习性是具体化的行动模式,是姿势、说话、行走、思维、感觉的习惯(布迪厄,2012:73—100)。作为一种习得的知识结晶,实践感不是储存在意识或心里,而是储存在身体里,当与生成习性的情境相同的情境出现时,这种情境就会激活这种身体化的实践知识,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主体也就有了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维沃尔卡,2017:29)。

虽然布迪厄的场域与习性的互构理论被批判为一种再生产理论,难以分析社会与个体的协同转型问题,但布尔迪厄曾经在多种访谈与工作坊中指出,身体习性遭遇时空变迁时会有时滞效应,会失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通过生命轨迹反思的方法来对自己身体习性的构造过程及其嵌入的结构化实践场域进行对象化、客观化反思。布迪厄的反思实践更多是通过对自己学术成长轨迹的反思,实现对社会学研究场域及其研究模式的反思,提倡一种反思社会学方法(布迪厄、华康德,1998)。然而,职业教育家唐纳德·A.舍恩提出,日常的职业行为也是一种职业习性,当职业习性面临行业转型而出现失效时,就需要反思行动策略。反思实践策略正是要把生命历程或者职业生涯中遭遇的各种挫折、困难和迷茫,借助实用主义所说的整体性框架试验,去检验过往行动程式的有效性,并发展新的行动模式,产生真正的主观能动性(舍恩,2007)。

本文试图把法国社会学家开创的生命历程研究中的实践惯习与实践场域的互构过程及其反思性策略,应用于对牧民身体习性之构造与转型过程的研究中,阐明牧区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动力机制问题。本文借助对一个青年牧民个人生命史的详细讨论,试图揭示个人身体习性如何被社会实践场域所构造,以及伴随个人生命历程的新实践场域与旧有实践惯习的错置所引发的困惑和对身体习性的反思重塑的动态过程,说明牧民主观能动性的发生机制及其追求新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机制。

三、田野资料与案例概况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主要基于笔者在2019—2022年间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简称西乌旗）所做的田野调查。研究的主线聚焦于一个拥有丰富信息的青年牧民巴图^①的生命历程。之所以突出这位45岁的青年牧民，是因为他可以看作“新牧民”代表——他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内蒙古草原游牧生计和文化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从传统走向现代，他们经历着“自我转型”的过程，需要自我重新认识、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变。

从2019年初识巴图到后来持续接触了解，笔者发现他身上有着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是自身有着丰富的经历，巴图当过兵、打过工、养过牛羊、种过青饲、办过合作社、做过公益人，他不像传统的牧民，固守着草原和牛羊，而是不断地与草原之外的世界有着频繁的接触，虽然有过迷茫和彷徨，但是他通过探索反思，找到了一种杂糅传统与现代的新策略。二是巴图认为自己是一个现代“新牧民”，积极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一方面他熟悉、热爱并依然保持着一些蒙古族牧民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追求现代性的生活，能够运用现代的科技、信息来为牧业的发展寻找新出路。三是巴图愿意对自己的生命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对草原和牧民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因此能够提供丰富、详细、关键的信息。对一个具体个案的“描述”不是目的，而是期望通过对个案深入、详细地展示，进而对牧民行动习性的塑造过程进行解释，进而回应生命历程研究方法中个体能动性的发生机制问题。

在2019—2022年，笔者持续跟踪记录巴图的生产生活行动。2020年7月，笔者一行对西乌旗相关的牧区合作社、社会组织进行考察，巴图作为向导，一方面为我们介绍牧区的发展与游牧文化，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全面观察、了解他提供了机会。考察的间隙，笔者对巴图个人和他的亲人、朋友等进行了深入访谈，进一步了解牧民实际的生产生活及巴图个人的生命史。2021年7—9月，笔者又进入巴图生活的嘎查^②，参与牧民的生产生

① 按照学术研究惯例，本文涉及的人名、机构名均为化名。

② “嘎查”在蒙古语中是“行政村”的意思。

活，补充了田野观察和访谈的材料。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的访谈和田野调查。

四、牧民能动性激发：从“草原情结”到反思性主体

埃斯科瓦尔（2011：256）指出，“我们现在的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混杂现代性（hybrid modernity），既没有悲戚地根除传统，也没有完全得意地迈向进步和现代，而是处于复杂的文化混杂化过程，包含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传统和现代”。正是在这种混杂现代性中，生命个体或群体往往会面对多种张力，身份认同可能会出现断裂与混合，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若要实现其与现代化更好地衔接，原有的身份就不得不经历重塑与再造。基于巴图的生命历程可以发现，土生土长的牧民需要将自身的“草原情结”转化成一种“反思性主体”，通过这种“反思性主体”的建立来完成自我身份整合，形成新的发展主体，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拼接与混杂的新发展策略。然而，新发展主体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各种实践场域不停地进行调整与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外部专业性社会组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一）“草原情结”：在逃离与返回中彷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草原牧区推行了“畜草双承包”制度，把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放牧改为牧民家庭承包的草场围栏放牧（敖仁其等，2015）。1985年，巴图所在的嘎查也开始了此项改革，家中排行老七的巴图分得了630亩的草场。和大多草原牧区的孩子一样，少年时期的巴图一边在家中帮父母打理草场、照看牛羊，一边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牛羊成群、蓝天白云、骏马奔驰”等形象可能给从未到过草原的游客带来的是美好与向往，而对于从小生活在此处的巴图来说，青年时期的自己更想“逃离”，一方面成年后的巴图需要成家立业，但630亩的草场很难养活一家人的生计，人地矛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草原上“白灾”（雪灾）、“黑灾”（旱灾）、“黄灾”（风沙灾害）等自然灾害层出不穷，牧民靠天吃饭，生计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一年四季不停忙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受“灭

顶之灾”。巴图说,那时看到的就是“苦”和“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他“不想和父母一样一辈子放牛羊,特别想去外边的世界看看”。

我哥哥姐姐们都成家了,父母自然要给他们分草场的,我们嘎查自己的草场面积太小了,人也多,这点草场,自己家吃肉不是问题,但是过好的生活就有问题了。那些年,草场被破坏得很严重,养牛羊也很辛苦,都是赔钱的。2000年冬天,我22岁,在新疆当了三年兵后回到家乡,我们嘎查1/3的牛羊全部冻死饿死。因为夏天干旱,冬天干旱,牧民又没有钱,完了以后饲料又进不来,所以我们嘎查一夜之间就返回贫困状态。那时候一个苏牧干部也就七八百块钱,你说在家放羊吧,家里就那几只羊,就好像看不到未来。(访谈资料:20200715 巴图)

受市场经济个体理性的影响,牧民逐渐丢失了集体化合作放牧时期的传统智慧和集体理性:牧民只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自家草场的范围决定放牧数量,但是对草场之外的气候条件、市场调节等外部因素无法协调,而且圈养围栏化也导致牧民丢失过去转场放牧的游牧智慧,致使家庭承包牧场围栏化放牧没有出现有效放牧,反而导致家庭牧场的草场退化和生计脆弱。有学者的研究表明,2000—2010年是中国北方草原快速转型的时期,市场化、干旱和相关草原政策的实施共同推动了牧区社会转型,牧民生计呈现新的脆弱性,牧区的自然资源持续退化,牧民的生产成本上升、债务增加(王晓毅,2016)。牧民应对生计脆弱的措施包括购买草料,出售、寄养家畜,外出打工等(丁文强,2019)。对于青年牧民来说,当草原原有的畜牧业生产无法满足生计需求时,他们就会走向草原外部市场,寻求新的生计与发展。巴图在部队退伍回家后,看到眼前牧民生计的脆弱性以及生活的无望,让他越来越想逃离传统畜牧业的生计。在巴图看来,此时的草原“看不到未来”,他和多数青年牧民一样开始感到不安,想要“逃离”草原,去探寻外部的世界。巴图走向了外出打工之路,期望通过打工改善自己和生活。在战友的介绍下,巴图开始了一段短暂的闯荡时期。

我给我战友打电话说家里的事情,他介绍我去广州当保安,

一个月才1 000多块钱,2001年2月我就去了,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然后就待不下去。6月份广州特别热,就感觉一直都在冒汗,那里吃的也都是素菜,我也不习惯。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战友,他在新疆,然后我就从广州跑到新疆,到了新疆之后半个月找到工作的,找到那个石灰矿,一个月也是不到2 000块钱,在那边待了五六个月,特别想家,到年底的时候我一个表哥结婚就回去了。亲戚们都说,跑那么远,就挣那么一点儿钱。(访谈资料:20200716 巴图)

从巴图外出务工的经历可以看到牧民生计抉择的矛盾:一方面,在家从事传统畜牧业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另一方面,被迫放弃传统生计,在外寻找各种生活出路,却又面临气候差异大、生活习惯不同、待遇差等问题。在牧区现代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巴图说他也想追求一种“体面的生活”,所以不断地想从外部寻找发展机会,例如参军、外出务工。而传统的畜牧业生活和外出务工两条出路都没有让他感到“合适”。不仅巴图如此,笔者在西乌旗的调研也发现,返乡青年牧民诉说外出务工的原因多为传统畜牧业“辛苦且风险大”,“想去外边多挣点儿钱”,而“不适应”“不自由”“想草原、想爸爸妈妈”,则是他们诉说在外务工经历时的主旋律。

在经历外出务工失败后,巴图开始向内寻求出路。他告诉笔者,“在外边挣不到钱,还不自由、不习惯,也没什么前途,牧民对草原最熟悉,我就想在牧区找自己的出路”。但是,巴图的回归并不是纯粹回到传统的畜牧业,在他看来,传统的畜牧业“风险极大”,且“回报有限”,回归传统的畜牧业依然无法满足自己现代生计发展的需求。“牧民的生计依靠牛羊,而牛羊需要的是草料”,基于这样的简单逻辑,巴图开始探索草原种植业,以解决冬季圈养牛羊的饲料问题。巴图继续向笔者讲述他返乡创业的经历:

从新疆回家,所有的亲戚都说要不要在一起弄个饲料场。我们想着,如果夏天我们能种地,我们可以保障自己,让自己的牛羊在冬天有草料可以吃,还能够卖给别人赚点钱。2002年3月份,我们就包了一块地,开始种植玉米青储饲料。但是你想的和实际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根本没有种过地,所以完全不懂。我们

4月份开始跑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的一些项目，苗子啊，灌溉啊，都是项目配的，如果不是项目配的，我们就倒霉死了。正好2002年雨水特别丰富，很多牧民完全没有饲料喂养的概念，理都不理，完全卖不出去，牛羊有草吃，也完全不喜欢吃饲料。（访谈资料：20200716 巴图）

从巴图的讲述中可以看出，重返家乡的种植业之路并没有理想中那么顺利。在看到草原发展中的现实需求后，巴图和亲戚们希望通过种植业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当时，种植的饲料获得了丰收，丰沛的雨水也让草场的天然牧草获得丰收，加上牧民坚持传统的放牧理念，巴图的饲料没有了销路。未能了解牧民的真正需求，且在各种不确定风险的压力下，巴图在草原的种植业之路也宣告失败。

巴图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多数青年牧民在他乡与原乡、传统与现代之间反复纠缠以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就蒙古族牧民而言，“世代以草为生，为草而活……塑造了传统牧民对于草原的特殊感情，并围绕草原建构起一套独特的惯习和传统，成为他们表达内心情感和信念的精神世界”（张昆，2018：24—25）。这种精神世界是传统牧民心灵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一种由多种感情构成的复杂情绪，并且持续不断地影响主体构造，可以称为“草原情结”。青年牧民的“草原情结”是一种复杂且矛盾的感情与心理。第一，它是一种对传统畜牧业不确定性的无奈，面对草原放牧生计生活日益严重的脆弱性，青年牧民有一种身在其中却想要“逃离”的愿望，想要抛弃传统，寻找新的出路。第二，它是对草原生活不舍与留恋的情感，是一种逃离与返回的矛盾情感模式，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缠结构。显然，草原放牧这一生活场域形塑着牧民的行动惯习，而这一行动惯习正是某个场域固有的实践模式体现在身体上的具身性产物，尽管理性上要逃离原有的生活方式，但是一旦发现自己原来养成的行动惯习和新的现实不适应，具身性的反应就会重新定位，成为返回的动力。草原情结的复杂与矛盾，促使以巴图为代表的青年牧民在走出与返回间彷徨，他们理智上想要逃离脆弱而无望的传统生计，但是又拖着滞后的在草原牧场养成的行动惯习。新的实践场域与旧的行动惯习之间的错置，正是支撑像巴图这样的青年牧民在原乡与他乡、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的基本动力基础。

（二）反思性主体的塑造：在社会组织的培育中反思牧区发展方式

从外出打工到返乡种植，青年巴图在“草原情结”的纠缠中不断尝试各种生计方法，也在这些尝试中引领自己反思现有的发展方式。巴图逐渐认识到自己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摸索生计之路，而对外部世界以及“牧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巴图说：“我那时就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我们还是上学太少了，也不懂怎么跟外部的人联系，不懂市场，即使我们的牛羊肉很好，也卖不出价钱。”返乡的前几年，巴图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也在不断摸索，希望打通与外部的联系，来重新获得一条可靠的稳定发展之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巴图接触到社会组织，在参与的过程中，他说他的思想“有了第一次冲击”。用巴图的话讲，“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社会组织，只是想看看外部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就不断观察，看那些专业的人是怎么看草原，看牧业和牧民的，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生活的这片草原”。

2005年6月的时候，东乌旗开了一次草原环保社团的会议，我和40多个牧民抱着好奇的态度去听这个会。那个会，我很惊讶，也学到了很多，我意识到我们才是草原的主人，我们牧民自己都不保护我们的草原，谁能来保护呢？当时正好北大的一个老师在兰州开一个西北草原资源管理的研讨会，我感觉这是个机会，我就去银川参加这个会，那时候他们在做一个牧民的小额贷款，还有草原资源管理。当时真的是大开眼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组织，把我们牧民当下的问题都说得很清楚，我自己虽然也有这种感觉，但是说不清楚。他们围绕的都是我们牧民的问题，人家外边的人，都在关心草原，关心牧民，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牧民，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草原。（访谈资料：20200720 巴图）

社会组织对行动者的意外刺激显得十分重要，这正是“反思性主体”意识塑造的萌发阶段。巴图通过偶然的机会接触到社会组织，并在社会组织中观察和学习，认识到“牧民自己才是草原真正的主人”，其内部的主人翁意识被激起，进而去关注、关心并投入草原的管理中。在社会组织的培

育中,牧民主体性的“种子”逐渐发芽,这种主体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与“草原情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草原情结”是激发牧民投入草场发展的情愫所在,但牧民本身无法简单地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达到现代化的自主适应,这就需要一个跳出来反身回观的机会,来让牧民重建对所在场域和自身发展方式的认识。与此同时,仅在意识层面的觉醒还不能让“要成为”真正发生,行动者的主体性需要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反思对话,才能转换原来的身体习性,变成一种主观能动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培训和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

2006年开始,我就联系一些人,参加社会组织的一些培训。北京有一个专门机构是搞能力建设培训的,我去了,然后陆陆续续参加了几个培训会,学着怎么预防牛羊生病,生病了怎么治疗,学着怎么算账,怎么增加自己的收入,学着怎么去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草场……2007年,我去香港培训,看到90多岁的老太太,从一楼到二楼是他们家族所有有用的东西,就相当于一个博物馆,生活博物馆,我想到了我们的蒙古包……2012年我去日本学习培训的时候,看到日本那种自然学校,自然教育,又给我一个启发,我们蒙古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也需要这个东西。(访谈资料:20200720 巴图)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和培训是“反思性主体”意识塑造的重要阶段。正是社会组织的教育和培训让巴图开始掌握畜牧业以及其他的科学知识,也为行动者提供机会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把外部的多种发展模式与自己的经验进行连接,进而反思过往的发展方式和行动习性。通过不断地学习、交流、培训,巴图得到了“现代性的滋养”,也有了更多的问题意识。他观察到畜产品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牧民对牲畜产品价格完全没有主动权,当价格下降而饲养成本逐年上升时,牧民的生计陷入困境,而生计陷入困难时,牧民往往又会借高利贷,进一步增加了牧民的困境。他认识到草原的“五畜”^①失衡削弱了草原植被的自然恢复能力。他开始按

① 五畜指绵羊、山羊、牛、马、骆驼。

照在社会组织中学到的圆桌会议形式，与其他牧民一同探讨牧区未来发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孩子教育问题、牧民家庭婚姻问题、撤乡并镇问题、牧民高利贷问题等。巴图现在对于发展的理解不再是逃离草原或是简单跟风搞饲料种植，而是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的培训学会了参与式讨论对话的方式，与牧民一起讨论草原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并寻找在地化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牧民最擅长的事儿就是牧业……牧民的发展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让我们走西方那种牧场形式，不符合我们草原的生态。其实“草场—牲畜—人”，三者只有平衡起来，牧民才能真正得到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草场恢复，只有草场恢复了，才能缓解饲草不足和牧民生存环境恶化的问题。我们有游牧的传统，有互助的传统，就应该把这些传统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发展，推行合作社的经营方式，重拾我们集体的力量，才能真正发展。（访谈资料：20200720 巴图）

在社会组织的浸染中，巴图看问题的视角得到锻炼，发展的理念得以拓展，这时的巴图已经有了对现代性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精神也是一种新的身体习性的构造。这是在基于草原情结的再次探索中生成的次级身体习性，也是其走向新发展模式的微观基础。在这当中，社会组织的各种参与式培训与教育、外出参观与交流等，都给巴图提供一种不那么紧迫的反思性场景，使他可以对自己的草原情结进行反思，不断地激发主观能动性，并将这种反思能力始终贯穿在日常行为过程中（郑中玉、李鹏超，2021），进而探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另类结合方式。当然，外部专业力量对行动者主体性的刺激和训练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行动者不断地反思、学习、实践，再反思、再学习、再实践，不停地去建构自我的能力和素质，新的反思主体性才能生成巩固，并引导自我的发展与进步。正是这种新反思主体性的重塑，巴图才能把传统牧民智慧与合作力量融入新的发展方式中，也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对牧区新发展方式的探索。

五、牧区新发展方式探索

通过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生活实践的练习，巴图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反思能动性的新牧民主体，对自我的发展之路也有了更为理智的认识。他希望修正单户经营的方法，转变为合作经营方式，恢复季节性轮牧机制，实行资源整合，以互助发展、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提高牧户自力更生能力，减少牧户风险，提高牧户收益，紧紧围绕牧民生产生活实践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探索草原可持续发展方式。

（一）现代经营理念的运用

具有反思能动性的巴图日益关注牧民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也与牧民一起开始探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巴图利用各种机会与牧民一起改善牧区草场生态，寻求“五畜”的平衡；通过引进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帮助牧民缓解高利贷的压力；通过申请国家扶贫基金会的项目，来资助牧区的贫困学生……巴图和其他牧民一起成立了合作组织，使更多的牧民从原本彼此独立的状态，又重新走向了合作，他们还运用现代经营理念，专注解决牧民实际的生计问题。

能动性激发后的巴图已经有了对政策的“敏感性”。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让巴图看到新的发展契机。他意识到这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会”，他开始思考如何建立牧民与牧民的联系，如何让牧民走向合作。巴图认为，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必会促进牧区专业合作社的孕育和发展，进而可以促进更多牧民走向互助合作。

2007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第一年，7月1号实施，我7月3号就召集周边的牧民开了畜牧业发展论坛。2009、2010年的会我都开过，我后来发现这个论坛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又是政府的人过来，又是大学的人过来，又是牧民参与，又是合作社参与，又是企业参与。那几年讨论，首先要解决当时牧民的生计问题，首要就是牧区高利贷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我们牧民自发性的讨论的是三个方案……我们成立了牧民合作社。（访谈资料：20200819 巴图）

2008年,巴图和同伴共同成立了H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首先解决了牧民的小额信贷问题;其次是多方联络、建立渠道,解决牧民的羊肉销售问题;最后是抓住各种机会,开办各种合作社培训班、交流会,对牧民不断培训,进一步培育牧民的现代经营理念。H专业合作社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组织:一是合作社的经济属性,服务于合作社社员的现实问题;二是公益服务性质,推动牧民合作发展能力建设。巴图说:“我们当时特别需要真正地解决高利贷问题,所以H合作社一开始主要功能就是为牧民提供贷款。不仅解决资金问题,还解决兽药问题,真正请一些兽药专家来给他们讲解畜病防治的知识。”

巴图和伙伴创立的H专业合作社主要为牧民提供小额信贷、兽药、饲料统一采购等环节的合作;同时,邀请当地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给牧民讲解牲畜病防治讲座。通过这种方式,H专业合作社初步解决了牧民发展的资金问题、畜病预防问题等。据合作社的统计,其业务已覆盖16个嘎查,累计发展社员达500户以上(牧户草场面积38.5万亩),贷款金额9000万元左右,累计销售5万多只羊,直接受益牧民达4000户左右^①。在调研中,我们也观察到H合作社服务牧民的案例,闹日吉家的贷款问题,恩克家牛羊的兽药问题,乌尼吉家牛羊的销售问题,图雅家的饲料问题都在合作社的帮助下得以妥善解决。

同时,通过合作社传播现代知识与理念,也增长了牧民的现代化经营意识。通过邀请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牧业专家开展讲座,牧民自己就可以看出牛羊常见的病害,一些财务培训教会牧民怎么管理草场、怎么理财。一些牧民还发展出畜牧加工产业,例如奶制品的制作、羊尾油做的手工皂等。这带动了一些年轻人重回草原,激发了牧区社会发展的活力。

2014年元旦,我们组织了30多个牧民去农大找老师,一起探讨羊羔价格下降的问题。农大这边来的也是牧区的孩子,100多个学生,一起探讨这个现状。我说,你们毕业以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回家乡创业。学生都说,我们长这么大,就没有人和他们说过要回牧区创业。就那一次,我们影响了好多大学生,起

^① 资料来源: H合作社内部统计资料。

码有1/3的学生之后都回家乡了……我们合作社在2014年8月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招募广告，我们本来招2个人，结果报名的有30多个人，就现在这些大学生都是那时候招聘进来的。（访谈资料：20200911 巴图）

总体来说，H专业合作社一方面针对牧民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开展服务，将互助合作的理念深入牧户中；另一方面通过公益性讲座、培训，把现代科学知识传播给牧民，带动更多青年牧民回归草原，成为新牧民。此时的巴图及其伙伴们已经拥有学习、适应现代化的能力，能够将外部学习的知识运用到牧区的发展道路上。他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公益人、经营者、牧民开展各种工作坊来学习现代化经营知识，将其与传统的游牧文化智慧相结合，走可持续、牧民主导的牧区发展道路。巴图及其伙伴们已经懂得并善于经营，拥有了牧民、公益人、经营者、投资者、理事长等多种身份。他们已经能够对如何发展、为何发展、谁的发展等问题做出反思性理解。可以看到，这些新牧区发展方式不是对传统的抛弃，也不是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漠视，而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将传统游牧生计方式与外部现代性知识逐渐关联起来并融入发展过程中。

（二）传统游牧智慧的引入

前文已经对草原生态与生计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讨论。无论是草畜双承包，还是牧区城镇化的定居开垦，或是拉网围栏，都对草原的生态平衡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僧格对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牧区社会发展状况的调查情况表明，一种恶性的牧区经济增长的循环链已经形成：牧民家庭贫穷—寻求经济利益—增加牲畜数量—有限草场超载—形成过度放牧—草场退化沙化—牲畜数量锐减—牧民家庭更加贫困（僧格，2009）。因此，要处理好牧民生计发展与草原生态平衡之间的张力，引入传统游牧智慧就显得尤为必要。当面对游牧业的凋敝、牧民的窘境、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等现实时，重拾牧民身份的巴图也在不断反思传统游牧智慧的意义。经过社会组织的培育，巴图已经对游牧文化传统智慧的重要性有了清楚的认识，他联合一些青年牧民一起将传统游牧智慧带入牧区社会治理中，打造新的牧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巴图联合15户牧民，组成了新的适度规模合作放牧，共同组建了新

的D合作社。首先他们拆除各家内的网围栏，以在有限的地域内扩大放牧的空间与流动性，以便重新让草场生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二是合理计划牲畜的种类、数量，重新恢复五畜并牧，探索五种牲畜各自的适度规模，以便按照草场的承受力来平衡草场的生态和合作社的发展。三是综合规划草地的使用，草场连片经营，发挥其整体功能，按照区域划分出不同的四季牧场，实行划区季节性轮牧，有效利用和保护草场，让五畜均衡发展。四是恢复传统的互助组织形式，按照牧民的能力素质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协作，以促进牧民的交流与合作。

虽然是现代化，但也是由游牧智慧和五畜组成的，“牧民—草原—五畜”三个是不能分离的，谁都不能离开谁。游牧智慧需要我们重新拾起来，从牧民的生计开始，我们所有创新运行的模式，都在想如何支持牧民、五畜，还有草原共同发展，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访谈资料：20200805 巴图）

当然，引入传统游牧智慧并不是对过去简单地复制，而是基于主体的需要加以改造。例如，现代合作社的游牧方式是在“冬春季营地建设有完备的防灾设施和饲草料储备的基础上，实现夏秋季逐水草而游牧”。草场、畜群、劳动力三位一体的紧密型合作组织在牧民自愿协商基础上组建起来，并有一套简洁明了、容易操作、被牧民普遍接受的契约制度来维持（敖仁其，2011），而这些契约制度的设置与传统游牧文化智慧息息相关。与此同时，15户牧民还将传统的技艺与现代技术相互结合，开发了一系列的品牌，如羊尾油手工皂、奶食品等，通过这些产品的开发、加工、销售，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牧民的共同收益。

传统的游牧智慧甚至影响着牧民的经营理念。在田野中可以发现，这群牧民都有着“适度发展”的共识。在D合作社的新任理事长看来，“合作社将来要发展多大规模，与团队建设和文化建设有直接关系，合作社的规模也不会那么大，最多20~30户的规模”。这种适度规模是基于社员对合作经营管理理念的认同，也是一种更为务实、稳定的发展策略。在D合作社的另一位理事看来，“合作社不会盲目地扩大合作的规模，但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深加工。第一产业养殖产业已经有了，二、三产

业是将来规划要增加的”。而且，D合作社的三个年轻的核心社员，对个人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也是适度的。在他们看来，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是不同的，他们的理想“不是挣到那么多钱”，而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而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也追求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美好生活，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是基于草原传统文化智慧的传承，以及对合理生活需求的适度满足和保持与外界的适度接触而建立的。围绕着传统生计方式发生、发展、变迁及传承，游牧文化智慧、知识、技能正在被重新认识和发展，新一代牧民也在不断进行自我培育，重新认识、调整、改变自己，这不正是逐渐走向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游牧文化的“文化自觉”吗（费孝通，2003）？

六、结论与讨论

关于主体性的理论讨论和经验研究一直在学界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多数学者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地位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姜佳将，2018；衣俊卿，2004；余晓敏、潘毅，2008），认识到主体性的生成是主体所生存的制度环境和塑造主体的各种力量相互角逐的结果（宋少鹏，2013）。因此，主体性并不等于主观能动性，它可能只是一种被结构化条件所塑造的行动习性和身份认同，而不一定能够发挥积极主动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具身化的身体习性如果与特定实践场域的结构条件相匹配，那么就能发挥一种默会的实践智慧的功效。但是在遭遇新旧实践场域错置的时候，具身化的身体习性就会面临失效的风险。此时，大部分微观主体凭借原有的微观机制，要么停留在某种失效的行动模式里迷茫困惑，要么凭借社会关系跌跌撞撞地摸索出一条新的行动路线。但是，若想在社会转型期自觉寻求个性化发展道路，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职业精英，都需要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创造条件去自觉反思过去的生活模式，才能显示出其行为习性的有效性条件，并借助于一种“跳出来、回头看”的机会，重塑和转换这种身体习性，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主适应能力。借助青年牧民巴图的生命故事及其从“草原情结”向“反思性主体”转变的过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求牧民“发展能动性”生成所可能具有的内在结构性力量与动力机制。

对于土生土长的牧民而言,“草原情结”是一种原初的身体习性,是内心深处传统与现代转变过程的复杂情结,更是一种本能的现代发展冲动与传统保存的矛盾体验。它是一种由多种感情构成的复杂情绪,牧民一方面期望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愿意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另一方面面对草原的不确定性与传统牧民生计的脆弱性,只能在“逃离与返回”之间彷徨。这是一种“说不清的我”,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习以为常”的“习惯”(刘亚秋,2020a)。巴图在返乡和外出之间不停徘徊,也在不停摸索、尝试自己的发展之路,与多数的青年牧民一样,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和对未来的“渴望”,也经历着各种波折和困难,但他们始终与生活的场域密不可分,其习惯和技能、情感与态度以及生活的经验都是来自对所在场域的过去生活经验的适应,同时又遭遇现代性力量的诱惑与介入,并内投到身体里成为一种不安与躁动的力量。作为一种彷徨的迷茫的原始力量,“草原情结”是牧民下一步活动不可或缺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它不是一种能动性,而是个体行动的原动力,是牧民在原乡与他乡、传统与现代、走出与返还之间的基本动力,正是这种情结及精神,帮助牧民检验了自己的主体性。“草原情结”必须要在特定时空条件下通过反思回观的策略,引导牧民反思自己彷徨迷茫的行动历程,逐渐生成一种历史性的“反思性主体”,才能成为一个能动的主体,进而整合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产生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来。

“反思性主体”是对牧民身体习性的重新构造,这是“草原情结”在不断发展探索中生成的次级身体习性,也是其走向新发展模式的微观基础。当主体拥有“反过来针对自身并监控其自己行动的能力,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反思性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40)。反思性主体的生成需要一定的契机和过程,只有不断地对行动者进行训练,让行动者本身能够对自身及所处的场域有自知之明,才能在生活中发展出主观能动性的新特质,“在意外经验的刺激下,反映实践者会将注意力集中到行动上以及行动中所隐含的认识中,对其行动中隐含的理解进行反思,这些理解被他揭露、批判、重组并融入到未来的行动中”(舍恩,2007:40)。一旦反思性主体习性生成,主体在危机与风险面前,才可以有意识地创造自我实现的方案,进而抓住生活事件机会,化解矛盾,进而探索新的可能性。而从生活事件中学习到的经验也会转移到其他生活事件中去,进一步探索新的发展方式。

巴图正是在社会组织的培育下逐渐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并将学到的经验转移到下一步的发展探索过程，从而不断调试自己的认知和发展模式。

费孝通先生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的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地区和20世纪90年代的黑龙江赫哲族的考察，看到了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下的生存危机，从而思考少数民族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又如何能将自身文化保存下去？他提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文化自觉”的策略（费孝通，2003：15）。尽管费先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途径清单，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至少包含了两个基本过程，一是自知之明，二是自主适应（刘亚秋，2020b），二者都需要一个反思性主体的构造为基础。行动者需要不断地对自我行动和生活实践进行反思性回顾，在反思中发展、调试，才能把习以为常的行动习性转变成一种自知之明，从而产生自主适应能力，进而理智地寻找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之道，探索新的发展方式。牧民巴图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过程需要通过外部专业组织的协助，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来反思自己的行动习性，并探索学习在地化的实用性解决问题的策略。因此，外部专业社会组织对于发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构造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外部专业性社会组织进入农村和牧区，帮助农民和牧民提高他们参与乡村治理和合作发展的能力（王春光，2018）。巴图身体习性的转变与对发展方式的探索，就来自于他所受到的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教育培训与体验式学习。提供更多参与性培训和体验式学习机会给牧民，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反思性主体，并找到一种融合传统生计方式与生存智慧、现代科学知识 with 经营方式的新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 埃尔德，G.H.，2002，《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埃斯科瓦尔，阿图罗，2011，《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叶敬忠、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敖仁其，2011，《牧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初探》，《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第2期。
- 敖仁其、艾金吉雅、韩柱，2015，《牧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财经理论研究》第3期。

- 包智明、石腾飞, 2020,《牧区城镇化与草原生态治理》,《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布迪厄, 皮埃尔, 2012,《实践感》, 蒋梓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布迪厄, 皮埃尔、华康德, 1998,《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布尔迪厄, 皮埃尔, 2017,《实践理论大纲》, 高振华、李思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曾迪洋, 2016,《生命历程理论及其视角下的移民研究: 回顾与前瞻》,《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 丁文强、侯向阳、董海滨、李西良、尹燕亭、刘慧慧, 2019,《牧民生计资本对旱灾应对策略的影响: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草业科学》第12期。
- 费孝通, 2003,《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第3期。
- 韩念勇主编, 2011,《草原的逻辑(第二辑)——顺应与适度: 游牧文明的未来价值》,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吉登斯, 安东尼, 2016,《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姜佳将, 2018,《流动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的妇女意识与实践》,《浙江学刊》第6期。
- 李强、邓建伟、晓箐, 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亚秋, 2020a,《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性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4期。
- , 2020b,《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和人的主体性——费孝通学术反思的两个主题》,《人文杂志》第12期。
- 麻国庆、张亮, 2012,《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 内蒙古阿拉善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发展》,《开放时代》第6期。
- 僧格, 2009,《转型期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与青海蒙古牧区的实地调查》,《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 舍恩, 唐纳德·A., 2007,《反映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 夏林清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宋少鹏, 2013,《能动的主体和刚性的制度: 路在何方? ——〈打工女孩〉和〈中国女工〉的不同出路》,《开放时代》第5期。
- 王春光, 2018,《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王晓毅, 2016,《市场化、干旱与草原保护政策对牧民生计的影响——2000—2010年内蒙古牧区的经验分析》,《中国农业观察》第1期。
- 王星、周重礼, 2023,《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技能重组与小农主体性建构——基于M村制茶产业变迁的过程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维沃尔卡, 米歇尔, 2017,《社会学前沿九讲》, 王鲲、黄君艳、章婵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荀丽丽, 2011,《与“不确定性”共存: 草原牧民的本土生态知识》,《学海》第3期。
- 衣俊卿, 2004,《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余晓敏、潘毅, 2008,《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昆, 2018,《根在草原: 东乌珠穆沁旗定居牧民的生计选择与草原情结》,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19,《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多元发展策略——基于东乌珠穆沁旗牧民家庭经济的人类学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郑中玉、李鹏超, 2021,《超越“被简单化的民众”——历史街区改造中民众主体性视角的研究》,《社会学评论》第2期。
- 郑作彧、胡珊, 2018,《生命历程的制度化: 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 第2期。
- 周雪光, 2015,《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 郝大海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Bertaux, Daniel & Martin Kohli. 1984.“The Life Story Approach: A Continental View.”*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
- Bertaux, Daniel & Isabelle Bertaux-Wiame. 1981.“Artisanal Bakery in France: How It Lives and Why It Survives.”In Frank Bechhofer & Brian Elliott (eds.),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Exploring the Micro Mechanism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Herdsmen's Livelihoods: A Sociological Life Course Study

Guo Weihe Jia Cong

Abstract: Life course research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ost life course studies focu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opportunity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It automatically assumes that individuals are active subjects and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ize the structural opportunitie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However, agency is not

inherently predestined, but a subjective feature transformed through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hysical habits shaped by a specific life field. Through the retrospect of the life course of a young herdsman,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the swinging “grassland complex” produc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omadic livelihood to the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livelihood is transformed into a reflective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the life course, and then by combining traditional nomadic culture and the modern development way, to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dilemma of binary opposition.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expands the paradigm and vision of the study of life courses in China and brings the remodeling process of the micro-subject habit to the academic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rdsman’s grassland complex, it shows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nomadic livelihood.

Keywords: life course; grassland complex; reflection subjectivity; new development mode

(责任编辑: 卫小将)